

战时经济生活与抗战大后方文学转型

廖海杰

内容提要 1940年前后，抗战大后方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在这一变局中，作家所属的文人阶层相比战前经济地位变化最大，有着强烈的被剥夺感，由此带来的文化心理变迁促成了大后方文学的转型。经济生活问题的凸显，使作家们将目光由想象的前线移回现实的后方，并从民族主义的文化凝聚力量中分离出来，重新看到个人生存问题。1940年是抗战大后方文学的转型之年，“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发起和《雾重庆》《八十一梦》的成功，显示了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生活问题对大后方文学转型的推动。此后，经济生活问题的书写成为抗战大后方文学的重要一脉。这一脉被遮蔽的文学，呈现着20世纪40年代两场战争及其伴随的文化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态，它作为关节点联结起了两大主潮——民族抗战和民主进步，显示了“史诗时代”的丰富性。

关键词 战时经济生活；大后方文学；文学与经济

谈论文学史分期，实质上是寻求对文学转型的解释。对抗战大后方文学而言，一直以来，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是重要的分界点。“皖南事变”说强调国共两党矛盾的激化对文学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又有以“夏季大轰炸”^[1]或“太平洋战争爆发”^[2]作为分界点的新论，则是从贴近历史现场和贴合抗战文化的角度提出的。当然，对于连绵不绝的历史，所有的划分都是由观者的目光所决定，不存在绝对的正误之分，仅是一个解释角度问题。本文也无意对这段文学史的分期再作讨论，仅是基于笔者对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恶性通货膨胀问题的理解，补充关于大后方文学转型的又一种解释。

文学的转型，归根结底与文人心态、情感的变化分不开。“皖南事变”后的政治高压、夏季大轰炸对日常秩序的破坏，固然能够影响作家的心境，但对于大后方文人而言，另一件切身“大”事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无论使用上述哪种方法分期，大后方文学的转型都发生在1939—1941年之间，而正是在1939—1941年，大后方，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区域（即使用法币的区域），物价开始失控，通货膨胀开始转向恶性。对作家群体而言，原先像阳光空气一般“透明”存在着的经济生活问题，此时变得具体可感起来，这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精神震荡。

一 经济生活的发现与文化凝聚的消解

谈到抗战大后方文学的转型，首先就会涉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民族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党派文学诞生以来就一直试图构建的意识形态核心领域，甚至在许多时候，谈到“民族主义文艺”，自然就会让人想到国民党党派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文学就是国民党文人的专有领地。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左翼文学就已经开始了由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的转型^[3]，抗战文学由于有着“抗日救亡”“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总体也属于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学。初期的抗战文学更是一种典型的、带有极强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学，其实质是放弃自身独立性，以实现“国民精神总动员”为最终目的，成为配合战争的工具性存在。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民族国家意识、大众化、功利性这三个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救亡图存的大目标召唤出功利性的文学观，而功利性的文学观又与大众化本就只有一线之隔——工具的有效性要以效果来衡量，那么发动更大数量的人、起到更好的效果就必然有大众化的要求。此外，借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实现民族认同需要将自己与许多素未谋面的人想象为同类，即要有一种精神力量将人们凝聚起来，文学作为承担这一职责的工具，自然会在内容和形式上期待大众的认同。

于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力推动通俗文艺、战地文艺运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文学形态转向标语化、口号化、通讯化、通俗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了。这种特殊形态的初期抗战文学带有强烈的文化凝聚功能，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追求“尽量鼓起民众抗战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民族气节”^[4]。至于“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存在与否，并非作家们关心的头等大事，若是“与抗战无关”，那更不能容忍，用老舍当时的话说就是：“我们必先对得起民族与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文艺者，才有文艺。国亡，纵有莎士比亚与歌德，依然是奴隶。”^[5]这听上去确实可谓“救亡压倒启蒙”，但若以此判定抗战文学成就有限，就过于粗疏了。在1940年前后，“文协”同人展开了一系列理论反思，在创作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作品回归了新文学常态，战争初期那种特殊形态的抗战文学便告一段落。论者若试图反驳抗战文学“凋零论”，可以在后半段举出足够多的例子。

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抗战大后方文学转型。转型后，被描述出的前后两阶段的抗战文学已经不像同一种存在，那种“高度重视宣传功能、以通俗文学和短小通讯报告为主要艺术形式、集中描写和反映前线生活”^[6]的抗战文学逐渐式微乃至终结。在前一阶段信奉“有了国家，才有文艺”的老舍，此时也认为抗战文艺不应是“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7]了。这样的转换自然意味着作家们从“写什么”重新开始关注“怎么写”，换言之，文学的文化凝聚功能不再处于中心位置，属于个人的、文学性的追求又重新浮现。也正是在这样的转换发生后，最先起于左翼内部不同意见的“暴露与讽刺”论争才能达成共识——当作家们普遍不再狂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不再执着于文化凝聚后，现实批判才能重新获得空间。1941—1942年间，带有极端国家主义色彩的“战国策派”及其主张遭到左翼文化人的抵制、批判，这在1938年的文学场域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论其移植的德国思

想资源是多么不接地气，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核心主张毕竟与战争初期的时代情绪是符合的。“战国策派”此时遭到批判，显示着环境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此后如陈铨的《野玫瑰》、荆有麟的《间谍夫人》这类“为国献身”的作品被批判为色情文学，也意味着抗战初期的那种文化凝聚力已被消解。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抗战初期文学界中弥散的那种“民族至上”以至于连文学性也完全顾不上的激情，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这被看成是战局进入相持阶段，统一战线出现裂痕后，社会文化心态的自然变迁，所谓“政治低气压”的影响。这当然是贴近常识且准确的，但本文认为，还有一个值得补充的因素，与战争局势和政治氛围共同导致了时代情绪的变化，即文人群体在大后方恶性通货膨胀中的特殊遭遇。

自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短短两三年内就丧失了大量国土，其中大部分还是相当富庶的地区。税源的丧失使得如何筹集战争经费成为国民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超量发行货币汲取社会资源，在此时就成为一个不得已的选择（1935年的法币改革则奠定了这一政策的实施基础）。通货膨胀是战时许多国家的常见现象，但国民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把握却出现了诸多失误，再加上日军破坏法币信用的种种“经济战”^[8]手段，在1940年前后，大后方物价开始进入失控状态^[9]。此后，政府陷入了不断发行钞票填补财政赤字的怪圈，民众对货币缺乏信任，囤积、投机风气开始兴起，不断蔓延至全社会……

在新到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环境中，文人群体具有最严重的被剥夺感。

在曾执掌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张公权所著《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一书中，有名为“1937—1943年期间中国实际薪金和工资指数”的统计表格^[10]。据表可见，从1939到1940年，公务员和教师群体的实际收入骤然下降了一半以上，只相当于1937年水平的21%和32%，到1943年，更是仅为10%和17%，而通常被视为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的实际收益情况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知识阶层的实际生活比底层贫民

还苦,但至少相比战前,这一群体的被剥夺感是最严重的。知识阶层陷入悲惨处境,除了基于气节操守不愿改行和缺乏实际的社会能力而不能改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完全依赖货币形式的薪水生活。乡下人或多或少手中还掌握实物资产(粮食),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对于货币的依赖程度并不高,受通货膨胀的冲击自然也就有限,但知识阶层居住在城市或市镇,不可能离开货币而生活,便首当其冲地承受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知识阶层的薪水要么依赖政府,要么就来自并非市场“刚需”的教育、出版等行业。政府害怕进一步扩大通胀,严格控制着雇员工资的涨幅,而非市场“刚需”的行业早就自身难保,这更造成了知识阶层薪水的上涨滞后于物价的上涨,相比产业工人甚至一些基层体力劳动者也不如了。这正像梁实秋在《回忆抗战时期》中所记:

讲到抗战时期的生活,除了贪官奸商之外,没有不贫苦的,尤以薪水阶级的公教人员为然。有人感慨的说:“一个人在抗战时期不能发财,便一辈子不能发财了。”在物质缺乏通货膨胀之际,发财易如反掌。有人囤积螺丝钉,有人囤积颜料,都发了财。跑国际路线带些洋货也发了财。就是公教人员没有办法,中等阶级所受打击最大。^[11]

初看起来,这段话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一面是“没有不贫苦的”,一面又是“发财易如反掌”,其实不然。这种荒诞感正来自抗战时期的知识阶层所体验到的巨大差距。差距既体现在“发财易如反掌”的有办法者和“没有办法”的普通人之间,也体现在阶层地位的巨变上——战争爆发后,文人群体在经济状况上不但不如发“国难财”的幸运儿,甚至也不如很多底层劳动者了,可谓“斯文扫地”。这对于文人群体的心态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将沉浸在抗战文化凝聚功能中的作家拉出来,重新看到“个人”。经济生活始终是属于个人和小家庭的,而这一问题的凸显,使得文人群体不得不将目光由想象的前线移回现实的后方。经济窘境带来社会地位的下降,又使他们的尊严受损,而来自身份尊严的激情,正是人类产生高尚、无私

行为的心理基础。“私”的问题如此具体而及物,“士”的身份又从价值高位跌落到与普通劳动人民无异的境地,“天将降大任”(在战时的语境中,即是以文学为武器实现文化凝聚、精神动员)的意志,自然就衰弱了。个人体验的抒发重新成为常态,文学,自然也就返回了常态。

二是冲击了文化心理中民族情怀依托于国家政权的状态,使其产生裂痕,有了分离开来的可能。国民政府毕竟是名义上的合法政府,全面抗战初期“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提法,就体现了这种民族和国家政权二合一的状态。只有在民族救亡的热情与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统一起来的文化情境中,“暴露与讽刺”才能成为一个问题,才有可能产生基于此的论争。但战时的通货膨胀问题严重损害了国民政府的信用:法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与贵金属自由兑换的纸币,而是由政府信用担保的现代货币,法币的贬值本就意味着担保者国民政府信用的贬值。此外,文人群体(特别是其中的小公务员和教师群体)本是依附于政府财政生活,但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中,却并未得到足够的救助和生活保证,又看到了不少官商勾结“发国难财”的现象。强烈的被剥夺感影响了该群体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政府在经济上的不作为、乱作为,让文人群体心理上有了在别处寻求民族情怀寄托的可能^[12]。

总之,1940年前后恶化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生活问题,以强大的现实生存逻辑冲淡了抗战初期“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时代氛围。文人群体飞扬的激情受挫于生活,凝聚性的抗战文化出现裂痕。强烈的被剥夺感,又使他们从集体化的民族想象中脱离出来,重新变回关注生活的个人,重新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看到民族国家内部并非无差别的共同体,国民党政权也不一定能真正代表民族和国家。当然,这样的群体心理变迁轨迹,很难被实证材料证明,但却并非不能从各种形式的文本中被读解出来。

二 1940年:恶性通货膨胀与 大后方文学界的观念变化

从文学观念的变迁上看,“文协”同人在1940

年集中展开对过去三年抗战文艺运动的总结和反思^[13]，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经济史层面，1940年又是通货膨胀在大后方演变为恶性、物价逐渐失控的一年。时间上的重叠，并不意味着二者相关，但联系该年度大后方文坛的另外两件事，二者相关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1940年，“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兴起是恶性通货膨胀与文学转型的第一个联结点。

长期以来，“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在抗战时期文艺运动中并不很受学界关注，表面上看，它并不涉及思想层面的论争，而是在现实生存层面寻求对作家权益的保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运动又并非没有文化层面的独特意义。“保障作家生活运动”是抗战时期诸多文艺运动中唯一指向作家群体自身利益的运动，可谓是作家群体“经济自觉”之体现。它之所以能被发起，意味着抗战初期那种追求集体主义、文化凝聚的时代氛围已不能笼罩一切。该运动的目标是保障一个特定群体的利益，而特定群体的利益能够从高度统一的民族大义中分离出来单独寻求保障，本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传统意义上并非底层贫民的作家群体之所以能名正言顺地要求保护自身利益，正是基于他们在通货膨胀环境中体验到的被剥夺感。

因不从事物生产，作家群体所属的知识阶层确实在通货膨胀中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就在物价即将失控的1940年，老舍开始因贫血而头晕，后来又身患疟疾，贫血越来越严重，“病重的时候，多日不能起床；一动就晕得上吐下泻。病稍好，也还不敢多作事，怕又忽然晕倒”^[14]。1941年，洪深在经济压力下自杀，引发文化界震动，幸而经抢救脱离危险。张天翼、白薇贫病交加，叶紫、王鲁彦、万迪鹤等人更是因贫致死。正如茅盾多年后回忆总结的，“当年鲁迅称之为‘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中国作家们，现在连草都吃不上了”^[15]。于是，“文协”经过酝酿，在1940年1月27日，姚蓬子召集老舍、胡风、王平陵、阳翰笙等人，借《新蜀报》副刊《蜀道》之名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记录以《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蜀道首次座谈会》为题在1月31日发表，是为“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开端^[16]。这场运动

中途虽有断续，但也延续到抗战末期，后来在左翼力量的介入下逐渐发展出要求政府放弃图书审查制度、保障出版自由的诉求，进而汇入了民主运动的潮流中。但在开端的1940年，该运动的主要诉求还是让出版界提高稿费和版税，“试图维系晚清以来的现代性传统，把因战争威胁而濒临崩溃的文学生产的商业化运作模式重新建构起来”^[17]。但显然，祸根不在出版界，而在严重的通胀形势，在物价飞涨的掠夺中，同为知识阶层的读者群体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出版商也自身难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学市场的萎缩，让作家群体转而寻求有关党政部门的支持。“文协”总务主任老舍就曾呼吁政府介入，发放“文艺贷金”和“救济金”^[18]。“文协”的呼吁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呼应，1940年4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等机构组织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文协”各部负责人参与其中，之后近一年间，确实展开了救助作家和奖励文艺作品的工作。不过，“1941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另外成立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无形中也就被取消了”^[19]。总体而言，国民政府对作家的救助覆盖面不广，效果有限。

“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在初期寻求政府支持，看上去是不得已而为之，实则是前期那宣传工具式的、发挥文化凝聚功能的抗战文艺观下自然而然的选择。中国的抗战是一场“总体战”，前期的抗战文艺也是战争的一部分，既然作家们是在为抗战效力，自然是高度凝聚在政府周围，从政府获得报酬也就理所当然。事实上，正如姚蓬子在1940年初的那次座谈会上所说：“今天所有的杂志都是有它自己的固定的经济来源的，希望以杂志养活杂志，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20]“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就是高度依赖政府补贴的。在前期抗战文艺机制中，文学“依靠党政机关的补助，以‘机构订货’和商业化相混合的形式进行生产和传播”^[21]，从经济关系看，此时的作家就是广义的公务员。这种机制在经济形势未恶化前尚能维持，但到1940年前后，物价在上涨而政府的补贴却没有随涨，作家的生活便难以维持了。在国民政府这一边，显然也并未真的将作家当作国家公务人员看待。更何况，即便是真正的公务员，在国民政府严重的财政压力

和避免进一步刺激通胀的考虑下，薪水增长也极其缓慢，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在恶化的通货膨胀形势中，国民政府事实上没有尽到足够的责任来维持前期抗战文艺的独特机制，在经济上作家与官方脱钩，多数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就连抗战文学的领导机构“文协”在1940—1942年间，也“陷入了停顿状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符号，除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之外，文协一直没有发动和组织什么有实际意义的活动”^[22]。“文协”的这种停顿，意味着前期抗战文艺机制的解体，而停顿期间仅有的工作便是保障作家生活，这又显示了停顿与恶性通货膨胀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在1940年的发起，既显示着作家群体观念上的变化，又意味着前期抗战文艺机制的解体——作家的生活成为了问题，现在需要自己来保障。既然一种特殊的机制解体，文学返回常态化发展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因此，“保障作家生活运动”是恶性通货膨胀与大后方文学转型之间的联结点。

1940年，另一个经济生活问题与大后方文学转型的联结点，是文学创作上实绩的取得，具体来说，是《八十一梦》和《雾重庆》两部作品获得成功。问世于当年的《八十一梦》^[23]和《雾重庆》，显然与前期的抗战文学潮流大异其趣，成为大后方文学转型的标志性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在情节上都与恶性通货膨胀及其带来的经济生活问题高度关涉，其中凝聚了作者在战时经济生活中的体验。

《八十一梦》和《雾重庆》并非如后世文学史叙述中常常简化的，是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暴露与讽刺”乃至民主斗争的作品，其中的主要情节与战时经济生活问题更有关联性。也正是因为对人人感同身受的经济生活问题进行书写，两部作品才能既取得社会反响，又基本处于意识形态的安全范围之内。《雾重庆》的主情节，是一群抗战青年在做生意中失去激情和理想，而生意之所以有必要做，又那么好做，正是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环境中的独特现象。《八十一梦》中的《号外号外》《生财有道》《狗头国之一瞥》《星期日》《忠实分子》《上下古今》《我是孙悟空》《回到了南京》诸梦（即全书

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经济生活问题，讽刺了物价飞涨的大背景下商人的贪婪、官员的腐败，又哀叹并自嘲着文人群体的境遇。两部作品中对国民党政权的直接攻击并不多见，故事中虽不乏腐败官员形象，却并不像后世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冒犯性。1940年，国民党政权也正在试图控制物价，严打囤积居奇行为，并枪毙了时任成都市长的杨全宇以杀鸡儆猴。在当时的环境中，恶性通货膨胀及其相关联的经济生活问题处于意识形态上的中性地带，书写大后方文人的窘迫和商人的得意乃至部分官员的腐败，也都“与抗战有关”，因为在《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廿四条正是“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24]。

但两部作品中对个人体验和商业行为的书写，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股力量，消解着抗战前期那以凝聚力为追求的民族主义文化。经济问题的凸显，使得面目模糊、高度均质化的国民想象在内部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分别。在物价飞涨中，一面是日益严重的生存压力，一面又是高额且随机的获利空间，人的命运被现代经济的大手摆布，在经济关系上，分化出了对立的群体。《雾重庆》所写的，就是一个小型的抗战青年共同体，最终因生意问题而分化，走上不同道路的故事。沙大千、林卷好、徐曼、老艾几个人关系的破碎，正是抗战前期那高度凝聚的文化氛围破碎的寓言（allegory）。《八十一梦》整部小说在结构上散乱破碎，但从最初一梦《号外号外》到最后一梦《回到了南京》，却循环围绕着同一个对立结构展开故事。《号外号外》想象了抗战忽然胜利的“号外”消息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震荡，胜利不过是使有办法的人增加赚钱的机会，而没办法的人只能在结尾处发出这样的感慨：“天下事，无论好坏，一切是小人的机会，一切是正人君子的厄运。”^[25]《回到了南京》则梦见了胜利后回到首都所见的种种乱象，作者希望“人民遭了这一次炮火的洗礼，多少晓得一点什么叫平等自由，从前几十个人住一幢房子，和一人住几十间房子，那种对比的事，以后决不会有，也决不许有”^[26]，但这希望只受到现实的嘲讽。《八十一梦》作为通俗小说，在情节设计中常常使用这种经济问题上的对立结构，对获利者的谴责是小说的核

心主题。由此可见，经济问题引发的内部分化，使得抗战前期那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文化开始出现裂痕，当一个人不再将素未谋面的远方人想象为同类，而深刻感受到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时，民族主义的凝聚力量就开始失效。

当高度凝聚的共同体想象不再牢不可破，个人便重新获得了空间。在《雾重庆》和《八十一梦》中，要求放弃个人利益、融入共同体大义中的崇高道德标准始终在场，但又从经济生活的个人生存角度溢出了另一种话语。作为抗战文学转型期问世的作品，《雾重庆》和《八十一梦》具有从两种维度解读的可能：一种是从抗战大义出发批判个人的软弱，把《雾重庆》读解为批判青年知识分子弱点的剧作，把《八十一梦》读解为批判缺乏民族国家意识的商人和官员的小说；另一种是从个人生存的角度理解个人被通货膨胀裹挟的无奈，在“同情”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转向环境。以《雾重庆》为例，该剧原名《鞭》，“鞭”的意象召唤前一种读法，而“雾重庆”所含有的环境批判意味则召唤后一种读法。仅仅是开一个小饭馆，就能获得暴利，物价的变动又如此频繁剧烈，为了守住既得利益，沙大千实在很难抵抗参与长距离贸易获得更多收益的诱惑，连林卷好也在一段时间内支持了沙大千进一步的经营活动。《雾重庆》中第二三幕之所以情节最为紧凑并备受称赞——“因受生活压迫而做生意，因做生意而想发财，以至于不自觉地做了国家的罪人，都很人情入理，无懈可击”^[27]——正是因为其中传递出的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时代体验。《八十一梦》也存在这样的双重解读可能，既可以看到是批判获利者，也可以理解为个人的无奈，进而批判荒诞混乱的环境。环境的最终负责者，自然只能是国民党政权。因此，两部书写经济生活的小说都在此后的接受旅程中逐渐变身为典型的“暴露与讽刺”作品，成为了配合国统区民主进步运动的斗争武器，这表面上看来是左翼文坛的征用，实则也是因为其内蕴的个人立场和个人体验。正如张恨水在战后所作《写作生涯回忆》中所说：“抗战是全中国人谋求生存，但求每日的日子怎样度过，这又是前后方的人民所迫切感受的生活问题，没有眼前的生活，也就难于争取永久的生存了。”^[28]当个

人利益不再被文化压力强行整合进大共同体利益中，当个人生存逻辑有了被尊重的可能，才有可能获得同情，批判的矛头就有了从个人转向环境的可能。

《雾重庆》和《八十一梦》是抗战文学转型期的代表作品，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从反面确认民族主义文化凝聚之必要性的工具性作品，又具有自然溢出的个人生存逻辑，通过经济生活问题发现国民内部的区隔，进而消解着民族主义的文化凝聚，有了被左翼文坛征用于抗战后期的民主运动潮流的可能。可以说，两部作品社会影响力的取得，既是时代变迁的症候，又切实参与到了文学观念变迁的进程之中。

不管是现实层面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还是文学创作层面的《雾重庆》和《八十一梦》的成功，都联结起了1940年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生活问题与抗战文学观念变迁、创作转型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试图证明，1940年骤然恶化的经济形势直接导致了抗战大后方文学观念和实践上的转型，但恶性通货膨胀及其带来的作家经济生活问题，确实是转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

三 “经济生活”的文学与政治

在抗战大后方文学中，对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生活问题的书写是重要一脉，但在过往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整合进“暴露与讽刺”框架中而不现。这一系列作品兴起于通货膨胀恶化、物价失控的1940年前后，显示了作家对现实的敏锐感知和迅速反应。在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八十一梦》和《雾重庆》问世之前，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生活指数表》（1939）^[29]就已经开始了对物价和通胀问题的讨论。此后，在抗战中后期和战后的时间“延长线”上，以战时经济生活问题构成主要情节的叙事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描写知识分子在恶性通货膨胀环境中的遭遇与行动。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宋之的剧作《雾重庆》（1940）、张恨水小说《第二条路》（1943—1945）、列躬射小说《吃了一顿白米饭》（1943）、茅盾小说《过年》（1944）、陈瘦竹小说《声

价》(1944)、骆宾基小说《一九四四年的事件》(1944)、袁俊剧作《山城故事》(1944)和《万世师表》(1945)、陈白尘剧作《岁寒图》(1945)、巴金小说《寒夜》(1946)等。

二是以恶性通货膨胀中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为主角,书写通货膨胀带来的现代乱象。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恨水小说《八十一梦》(1939—1941)、《牛马走》(1941—1945)、《雾中花》(1947)、陈翔鹤小说《一个绅士的长成》(1941)、张客剧作《国难财》(1941)、鲁觉吾剧作《漏》(1941)、《黄金万两》(1944)、《自由万岁》(1944)、王平陵剧作《维他命》(1942)、《情盲》(1943)、小说《娇喘》(1946)、杨云慧剧作《小事情》(1942)、陈瘦竹小说《囤积》(1942)、刘盛亚小说《点金术》(1942)、沙汀小说《三斗小麦》(1942)和《淘金记》(1943)、杨邨人剧作《新鸳鸯谱》(1943)、吴铁翼剧作《生意经》(1944)、徐昌霖剧作《黄金潮》(1945)、宋霖小说《滩》(1945)、甘永柏小说《暗流》(1946)、曹禺剧作《桥》(1946)等。

还有一些作品在情节线索中兼有被损害者与获利者两线,如茅盾剧作《清明前后》(1945)、张恨水小说《纸醉金迷》(1946—1948)、李劫人小说《天魔舞》(1947—1948)等。

由此可见,以战时恶性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经济生活问题为主要情节的作品是抗战大后方文学图景的重要构成部分。不过,某一题材衍生出的作品数量多,并不意味着它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笔者认为,这一脉文学之所以值得被看到,一方面,是因为它连接起了恶性通货膨胀与大后方文学转型之间的关系,能帮助打开一些从社会经济角度理解文学与文化变迁的思路;另一方面的意义则在于,这一脉文学关注的是“史诗时代”中的个人生存问题,其中显现的个人意识虽不似“五四”时代那般飞扬,但有一种对身处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生活不易的理解。正是对人的理解,让“史诗时代”的苛刻道德要求开始松绑。20世纪40年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社会人心变迁中,借助书写经济生活问题的文学,能帮助看到两场战争及其伴随的文化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态。它的存在,显示了“史诗时代”的丰富性。

详述这一脉文学中内蕴着怎样的个人意识和体验,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30]。简单地说,面对通货膨胀这一现代经济现象,面对传统经济社会中绝不会出现的物价飞速增长,作家们在作品中凝结了震惊与荒诞、拒斥与诱惑的时代体验。但震惊总是短暂的,不久就渐渐消逝,而对个人生存问题的再发现,却持续地使前期抗战文化那民族主义的凝聚力量弱化——当个人不再被苛刻地要求无条件为抗战牺牲,当个人面对物价飞涨时那如逆水行舟般的无奈被理解,批判的焦点就有了从个人移向社会环境的可能。人们开始思考,谁应该为经济乱象负责,直观可见的当然是商人,国民党官方文人也有试图以此解释问题的努力,但持续的物价上涨终于推翻了这一想象——若是商人操纵市场,怎会有连续数年不得平息之理?随着知识阶层生活的日渐困苦,对政府的不满自然日渐积累,同时,自身作为读书人的尊严也逐渐消磨。当文人的生活水准已与劳动阶层无异甚至更低时,原有的“士农工商”等级意识和现代教育带来的优越感便完全消散,认同感就逐渐产生。这时他们发现,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财富分配中,底层翻身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劳动人民仍然处于艰苦之中,而阔人的汽车在汽油短缺的年代照旧飞驰。正如费正清1943年在重庆街头感受到的:“由于通货膨胀日趋恶化,导致营养不良和失望情绪笼罩着薪水阶层。在外国观察家看来,左翼仿佛已开始成为可供选择的执政力量。”^[31]

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演讲中将“免于匮乏的自由”作为“第四自由”提出,在大后方知识界引发反响,倡导经济平等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广为传播,此后成为战后中间党派的主要思想资源。连国民党负责戏剧审查的鲁觉吾都在抗战末期出版了自己呼唤“第四自由”的剧本《自由万岁》。臧克家的诗歌《给他们一条自由的路》(1944)则可以作为个人意识再次凝聚进共同体的一个样本。这首追求“民主自由”的诗歌,指出的途径是再一次集体化:

中国的作家,属于全世界最英勇

同时也是最可怜的一群

他们有眼睛,却并不近视自身的穷苦,

而向着一个远景，
苦，苦死了也不抱怨，
这不是抱怨的时候。
他们是铁，在一只神圣的锤子下，
锤炼，发光，炼到了国家民族的整体上
成了不可分的一个！^[32]

只是诗中的国家，不见得再是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国家，而是被期许为代表被损害者利益的新共同体。到了1945年茅盾影响广大的剧本《清明前后》中，社会中下层联合在一起反对上层既得利益集团的情节出现并获得认可。在《清明前后》的故事中，下层小职员李维勤作为替罪羊被捕，妻子唐文君变疯。当唐文君被从难民群中带到严干臣公馆的客厅，此时实业家林永清等人也正面临某个神秘利益集团的代表金澹庵的折磨，社会从最底层到中层结成了被损害的共同体。最后林永清高呼出的“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也显然不单指代着工业，更暗示着被恶性通货膨胀折磨已久的国民经济。这种将少数特殊利益团体作为经济乱象责任人的“阴谋式国难财”想象，产生了巨大的说服力，也凝聚起了广大阶层的共识^[33]。对于战后初期的文学而言，知识界确立了官僚资本是乱象的始作俑者的认识，如当时的一篇文章所写，“中国经过了这几年的战难，文人们却几乎没有一个不‘左倾’了……在目前，‘左倾’是什么？是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专政、分裂’；是主张经济民主，反对官僚资本”^[34]。因此文学自然有着配合形成统一战线，推翻共同敌人的意图和再次走向工具化的倾向。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广大的被损害阶层的共识中，延安文学的大众化实践才在国统区得到了最顺畅的接受。

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史诗时代”，两场战争间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过程中，恶性通货膨胀及其相关的经济生活体验，对作家心理有着“解凝聚”和“再凝聚”的作用——先是“解”，从那笼罩一切的民族主义凝聚力量和相伴随的苛刻道德要求中分离出来，看到个人生存问题；再是“聚”，与受通货膨胀之害的广大人群结成了情感上的同盟。借助书写经济生活问题的文学，能看到一解一聚之间的文化中间态，也使得这一脉文学

成为关键点联结起了抗战大后方文学史前后两段主潮——民族抗战和民主进步。

于是，我们借文学观察到的抗战大后方社会文化心理变迁或许可以简化成“民族—个人—阶级”的三段式轨迹。这当然过于粗疏，但有趣的是，这也正对位于作为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组织中心的“文协”的三个发展阶段，即配合官方抗战、保障作家生活、左翼领导推动民主运动^[35]。如果说1940至1942年间陷入“停顿—保障作家生活”状态的文协最像一个民众团体，是从官方背景到被左翼文化力量控制的中间态，那么书写战时经济生活的文学，也就诞生并处于这种中间态中，直到《清明前后》所创造的“阴谋式国难财”范式，才使这一主题演变到了逻辑终点。总之，个人生存意识借由恶性通货膨胀中的生活问题复归，是对民族主义文化凝聚功能的消解，也正是在消解了想象的无差别的民族整体之后，才能看到国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差异，进而被民主进步的时代浪潮所召唤。本文探讨恶性通货膨胀、战时经济生活与大后方文学转型，既是补充一个转型动力学上的可能性，也意在初步揭示这被“史诗时代”诸种话语遮蔽的中间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大后方经济生活与文学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CZW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参见段从学《夏季大轰炸与大后方文学转型——从抗战文学史的分期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7期。

[2] 参见李文平《重论大后方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理论学刊》2011年第2期。

[3] 关于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细节，参见张武军《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第1—119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4] 郭沫若、老舍、张申府等：《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自由中国》第2号，1938年5月10日。

[5] 老舍：《努力，努力，再努力！》，《大公报》1939年4月9日第4版。

[6] [13] [21] 参见段从学《“抗战文艺”的历史特征及其终结——从文协同仁的检讨和反思说起》，《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7]《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

[8] 参见齐春风《论抗战时期日本的对华经济战》，《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

[9] 1940年前后作为大后方通货膨胀恶化的时间点之说，出自经济史家张嘉璈（张公权）《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New York: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8）一书。张嘉璈在民国时期曾任中央银行行长，此书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研究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经典之作，后在国内有名为《中国通货膨胀史 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和《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的两个译本。1940 年作为通货膨胀失控时间点，已是经济史学界共识。

[10] 参见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 1937—1949》，杨志信译，第 43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11] 梁实秋：《回忆抗战时期》，《梁实秋散文集》第 2 卷，第 93 页，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12] 参见严海建《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以大后方的教授学者群体为论述中心》，《重庆社会科学》2006 年第 8 期。

[14] 老舍：《贫血集·小序》，《老舍文集》第 9 卷，第 17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15] 茅盾：《雾重庆的生活——回忆录（三十）》，《新文学史料》1986 年第 1 期。

[16][17][19] 参见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18] 老舍：《怎样维持作家们的生活》，《老舍文集》第 15 卷，第 449—45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20]《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蜀道首次座谈会》，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第 294 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 年版。

[22] 参见段从学《论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形象变迁——以历届常务理事为中心》，《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23]《八十一梦》自 1939 年 12 月 1 日开始在重庆《新民报》连载，至 1941 年 4 月终篇，主体部分在 1940 年刊出，故将其算作 1940 年问世的作品。

[24]《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下册，徐辰编，第 128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版。

[25][26] 张恨水：《八十一梦》，第 22 页，第 279 页，南京新民报出版社 1946 年版。

[27] 孙晋三：《鞭——雾重庆》，《星期评论》（重庆）第 13 期，1941 年 2 月 28 日。孙晋三此文是《雾重庆》出版、上演后少有的关注其艺术形式的评论，他认为《雾重庆》存在较多情节结构、艺术技巧上的缺陷，浪费了良好的题材，但对第二三幕的情节处理给予了肯定。

[28]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见《张恨水研究资料》，张占国、魏守忠编，第 75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29] 本节作品名后的括号中所列时间，均为该作品的发表（出版）时间。

[30] 详见拙文《战时经济生活与抗战文学的“国难财”书写》，《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 年第 2 期（总第 33 辑）。

[31]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第 285 页，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32] 臧克家：《给他们一条自由的路》，《当代文艺》（桂林）第 1 卷第 4 期，1944 年 4 月 1 日。

[33] 关于《清明前后》所建构的“阴谋式国难财”想象，详见拙文《战时经济视阈下的〈清明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第 2 期。

[34] 耀：《文人与左倾》，《新文学》（上海）第 3 号，1946 年 4 月 1 日。

[35] 参见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第 8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高华鑫